

丁启阵◎著

恍如昨日

汉代以前士大夫群体的人文状况



東方出版社

恍如昨日

汉代以前士大夫群体的人文状况

丁启阵◎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如昨日－汉代以前士大夫群体的人文状况 / 丁启阵著.－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ISBN 7-5060-1789-X

I. 恍… II. 丁… III. ①士－研究－中国－古代②大夫－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498 号

恍如昨日—汉代以前士大夫群体的人文状况

作 者：丁启阵

责任编辑：张秀平

装帧设计：范晓莉

版式设计：陈 岩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装

出版日期：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5060-1789-X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内 容 提 要

文人士大夫群体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的精英，是政治制度的缔造者和主要维护者，是文明演进的创造者和积极推动者。要想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了解中国人文的演变，不能不先来了解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生存状况。

本书既有按照历史进程的叙述，也有个案的深入分析。著者在撰述过程中最想努力做到的是两件事：一是思想的新颖和深刻，二是语言的清新和流畅。希望它能成为一本新颖有深度并且流畅可读的书，希望能够真正引起读者关注中国人文史的兴趣。

目

录

壹 人文初始	1
一 青铜时代前期的生活景观	2
二 制度的出现与演进	11
三 贤明君主们	16
四 文化教育与士的阶层	26
五 原始诗歌	37
贰 轴心时代	38
一 春秋战国形势	39
二 知识与人品价值的崛起	45
三 人才市场	52
四 几种格外受欢迎的人才	63
五 所谓百家，所谓争鸣	71
六 独善其身	79
七 诗文之用	83
八 情感的大解放	90

叁 孔子集团	97
一 做君子儒	99
二 从政生涯	108
三 诲人不倦,弟子三千	117
四 著述原来为复礼	132
五 精致生活	135
六 郁郁乎文哉的团体	143
肆 儒生与暴君	150
一 秦帝国灭亡原因	151
二 傲慢的帝国统治者	153
三 残暴的帝国统治者	158
四 好大喜功的帝国统治者	161
五 秦始皇是“焚书坑儒”这出悲剧的主角	164
伍 帝国新声	173
一 逐步学会斯文的王朝	174
二 宽柔的统治	182
三 物质的丰富与心态的昂扬	193
四 经学大盛	207
五 赋家之心	218
六 多元的时代	228
后记	240



人

文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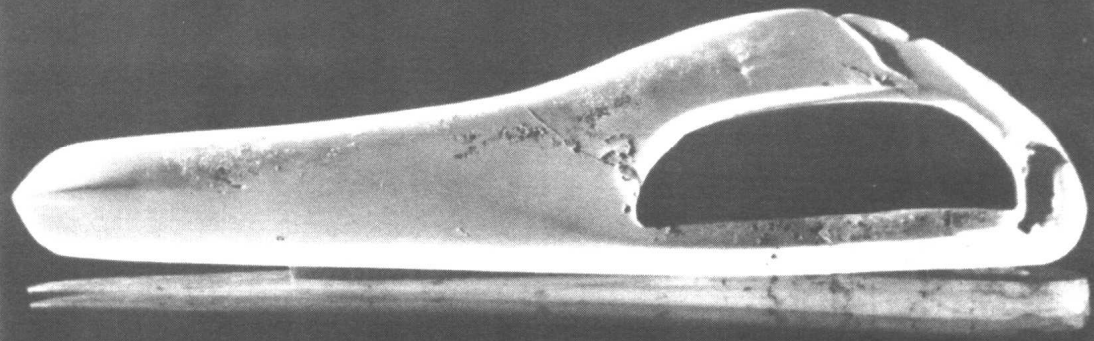
始

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来就有诗化政治的传统。这也许跟中国人偏爱诗这种说话方式有关系，也许跟大多数喜欢这种说话方式的中国人都有不可救药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兴趣有关系。

中华大地是一块广袤而古老的土地。就气候而言，从南到北，它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各种气候带，自东至西，它包括了海洋性和大陆性两种气候类型；就地形而言，有平原，有山区，江河湖泊一应俱全，当然也有戈壁、有沙漠。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资源物产十分丰富的大地，适宜各种生命的存在和繁衍，便于文明的创造和进化。

考古证明，距离今天 180 万年前，这块土地上已经出现了旧石器文化（山西南部的西侯度文化）。距离今天 170 万年前，已经有了直立行走的人类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云南元谋人）。这些文化的创始者和直立行走的人们，不但通过打磨石器进行采集和狩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通过点滴的经验积累，增强了自身生存的能力，壮大了种群的实力，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到公元前 2000 多年时，不但能够打磨、制作复杂精密的石器、玉器，还能够制造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具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创造出了可以表达复杂意





新石器时代石匕首

义和情感、结构复杂而美观的文字。在夏商周三代 1000 余年的时间里，政治制度、礼乐文化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后代的典范，为后人所景仰、效法。伴随着文明步伐的日益加快，以知识、文艺为安身立命之资的阶层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成为独立群体作好了准备。

上古时期的生活环境是恶劣的，物质生活是粗陋的，但作为文明的早期阶段，它也有着后代所缺少的那种简单朴素之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知性先驱们，在以饮酒、唱歌、奏乐、跳舞为娱乐的同时，也在发挥着知识的力量，凿开鸿蒙，铢积寸累地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行为原始却富有开创性。

一 青铜时代前期的生活景观

夏商周三代属于历史学家所说的青铜时代。考古的不断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时代不易被岁月、风雨所销蚀的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许多祭祀用具、生活器具，我们也对那时候的圣明君主的一些事迹耳熟能详，对于当时人们的

具体生活情形，我们却知之不多。但是，了解遥远时代人类的生活细节，却往往是好奇、柔情的人们永恒的兴趣。这里就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对那个时代生活在我们这块大地上的华夏先祖的居住环境、衣食条件、精神追求等方面作一些简略的描述。

原始时代，主要依赖采集、狩猎生存的古人，通常都居住在山林里。人口稀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滥砍滥伐，山林就格外茂密；山林一茂密，飞禽走兽自然就格外的多。总的景象就是“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往好的方面说，那样一种情况当然说明古人食物来源丰富，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为禽兽之中不全是温驯的麋鹿雉鸡，也有凶残的鸷鸟虎豹。为了躲避凶禽恶兽的侵害，聪明的先民发明了在地上筑巢而居的办法。《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五蠹》）；《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孟子·尽心上》说，舜的时代人们还是居住在深山里的，“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许是在巢居的同时或稍后，人们也发明了穴居。“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礼记·礼运》）。

吃的方面，在采集、狩猎时代，食物主要是“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食用方法无非是“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采集得来的野果，狩猎得来的禽兽，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懂得把它们制作成易于消化的熟食，很容易导致肠胃疾病。因此，先民在实践中又找到了利用火来烧烤食物的办法。《韩非子·五蠹》说：“食果蓏螺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火的发

现,使得人类文明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但是,在当时民智还没有开发的情况下,这一发现不知道用了多少漫长的岁月。在茫茫的黑暗中,人们忍受了多少疾病的痛苦,也是生活在医疗卫生有了很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所难以想像的。

人类历史永远是灾难不断的,上古时期当然不能例外。发现了火,解决了食物的消化问题,又出来水的问题。“中古之世,天下大水”(《韩非子·五蠹》),出来鲧、禹这样的治水专家,才摸索着去筑堤疏渠,对这种自然灾害进行化解的积极努力,而不再是一味的消极逃避。

天灾层出不穷,生产力水平又低下,那时候的生活自然也是简单粗陋的。《韩非子·五蠹》这样描述尧帝的生活:“屋子上盖的茅草不加修剪,砍伐来的椽子也不加斫削,吃的是粗砺的粟米,喝的是藜藿之类的野菜汤。冬天穿麂皮裘,夏天穿葛布衣”;禹帝的生活也差不多,劳作的辛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手里拿着锹锄一类农具,身先百姓,(因为劳动强度太大了,以至于)大腿上没有多余的肉,小腿上不长毛”。《墨子·节用中》也说尧的生活是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同时上谷子、黍子两种主食,菜汤和肉块都不超过两样的,用土碗盛饭,陶钵盛汤,用木勺子喝酒。如果真的是那样,尧、舜、禹等古代帝王可真是廉政的榜样了。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后人称述上古帝王的简朴生活,目的往往是为了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夏代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看,夏代虽然也大量使用陶器,但是青铜技术已相当发达,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铸铜作坊的规模相当大,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当时的青铜工艺水平也相当高了。二里头出土的一件



铜爵，据电子探针方法定量分析，含铜92%、锡7%，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均匀。有一件圆形铜片上，四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

河南二里头遗址
出土的合金铜爵

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出两圈十字形的图案，每圈都是13个。这件铜片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铜镶玉石”的工艺技术。当时的青铜器已经丰富多样了，主要有工具、兵器、礼器、乐器等。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建筑情况看，夏文化的宫殿建筑规模也相当之大，决非“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史记·太史公自序》引《韩非子》）。二里头第九发掘区发现的两片大型建筑夯土基址中，有一个东西长约36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个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50米。另外，当时的墓葬虽然还没有发现“人殉”，但是有“人牲”（用于祭祀的奴隶）的迹象。根据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1—4期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1900—1600年，均在夏代的纪年范围内（参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26—43页）。由此不难想像，所谓尧时的“茅茨不剪，采椽不刮”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

可见，夏代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像一些历史文献中所描述的那样低下，尧、禹等古代贤明君主的生活也不可能那样艰苦。

精神生活方面，当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贫乏到丰富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



的发展过程。《吕氏春秋·恃君览》描述“太古”时期没有君主，百姓“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颇像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孟子说舜虽然像野人般地生活在深山中，但是假如他听到别人的一句好话，见到别人的一个好行为，马上付诸实践，如江河决堤似的不可阻挡（《孟子·尽心上》）。说明古代圣贤精神追求的迫切。正是有了这种完全区别于禽兽的强烈的精神追求意识，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地进步着。

从考古发掘看，我们的先民在约公元前 4700 年时已经在使用金属器具了，公元前 4300 年至 2500 年创造了原始文字。其他的，如城市的出现、礼制的形成、贫富的分化、人牲人殉的发端，都记录了华夏民族文明进展的足迹（参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24—36 页）。这些都是有地下文物可以证明的。

文明的演进，离不开一大批聪明智慧的先民。通过文献中记载的民间传说，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智慧的创造者的姓名。物质文化的创造者有：伯余作衣（《淮南子·汜论训》）；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尧舜垂衣裳，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满，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上古穴居，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易·系辞传》）；奚仲作车，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弦作城，高元作室，虞姁（xu 上声）



神农像

作舟，乘雅作驾，王冰作服牛（《吕氏春秋·审分览》）；羲和造历，蚩尤造冶，奚仲造车，昆吾作陶，皋陶择羝裘以御（《尸子》）；神农作陶冶斧斤（《汲冢周书·考德》）；羿作弓，伾（传说为少康子）作甲，——巧垂作舟（《墨子·非儒》）；夷作鼓，垂作仲，雍父作杵臼，牟夷作矢，挥作弓，胡曹作冕，于则作冠，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作驾（《世本》）；倕作弓，浮游作矢，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荀子·解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世本》）。鲧作城郭（《世本》，又《淮南子·原道训》）。

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则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传》）；叔均（稷之孙）始作牛耕（《山海经·海内经》）；庖牺氏仰观天象、俯观地法，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易》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叙上》）；后稷教稼穡，仓颉作书，夔作乐（《荀子·解蔽》）；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吕氏春秋·审分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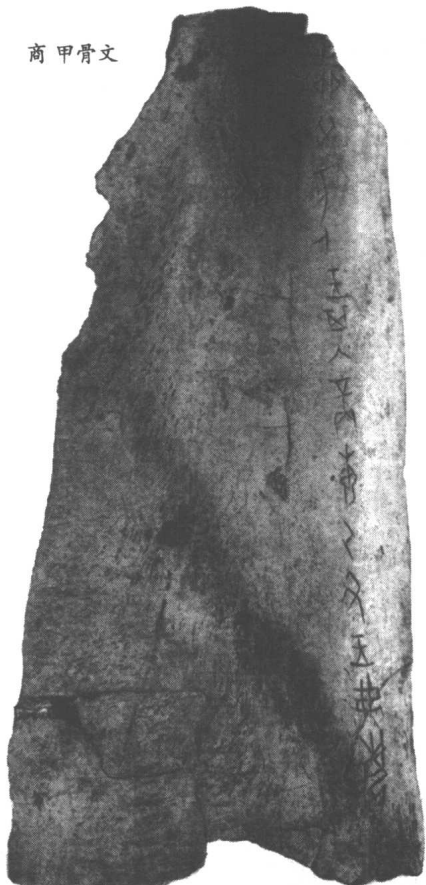
文献记载中，或重出，或舛乱，其中一定不免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们无意于考订某一项的发明人到底是谁，所以这些错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这么一批先民，在中华文明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这些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传说人物的背后，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他们通过劳动实践的经验积累，或者掌握一定的技术，或者制定了一定的制度，其职能都有些像今天的知识分子。

在这些创造发明之中，文字的创造尤其值得注意。历代文献都是把仓颉（也写作苍颉）作为汉字的创始者，人们对这位文字的创始者都怀有很高的敬意。例如汉代著名的文

字学家许慎就说仓颉创造出汉字以后，“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百官凭借它去治理国家，各种事物依靠它得到分辨）（《说文解字·叙上》）。从唯物史观上说，汉字当然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所创造的，它是多少时代、广大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仓颉不过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汉字的创造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下列考古发现可以供我们参考之用：距离今天约 7000 多年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第一期文化，在其 20 余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胎壁上，有 10 余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可能具有记事性质；距离今天约 6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有刻划符号 27 种，113 件。

这些刻划符号中有的通行范围达 100 公里。在这样大范围内使用相同符号，说明它们在不同部族中有着相同的涵义。这些符号有可能是文字的前身。这种刻划符号到距离今天 5000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商代后期，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表明这个时期的汉字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参看张之恒、周裕兴

商 甲骨文



《夏商周考古》139—140 页)。从大地湾、半坡等遗址的刻划符号,到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也许是中间尚有发展环节有待发现,也许各地文明演进速度并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汉字具有 3000 年以上的历史。它是目前世界上沿用不辍的最为古老的文字。

假如以是否能够熟练使用书面语言文字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也有 3000 年以上的历史了。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来说,当然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工背景。据记载,尧时虽然任用了禹、皋陶、契、后稷、伯夷、舜,封了文化礼仪之官夔、龙、垂、益、彭祖,但是“未有分职”。也就是说,当时连上层官员的职责都没有明确的划分。到了舜执政的时候,这些上层官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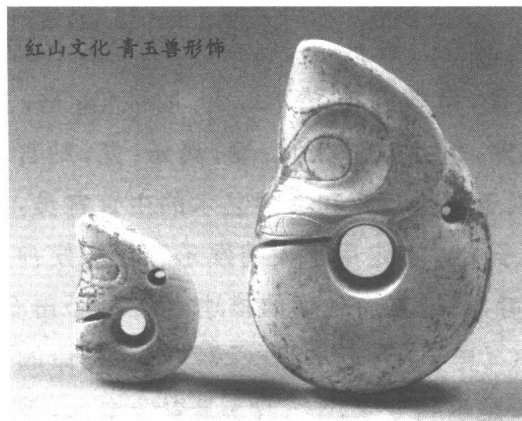
禹	众	白	臣
夔	垂	后	稷
契	牧	伯	夷
古	工	夔	舜
不	尧	舜	禹

甲骨文与今日文字对照

工。主要大臣的分工如下:禹,司空,负责平水土;后稷,播时百谷;契,司徒,敬敷五教;皋陶,士,明能信;垂,工;益,朕虞;朱虎、熊黑,佐;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这些官员中,夔相当于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主管官员,他的职责有教育贵族子弟,审定用于人间娱乐和祭祀娱神的诗歌声律。对于后者,夔自己有生动的描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史记·五帝本纪·舜》)舜所任命的高级官员都是专家,禹是水利专家,弃(稷)是农业专家,契是伦理专

家，皋陶是法律专家，垂是土木工程专家，益对山林川泽鸟兽有研究，伯夷精通祭祀程序，夔是文教艺术专家，龙擅长宣传（参《尚书·虞夏·舜典》）。专家治国，说明当时知识系统已经初具规模，需要术业有专攻了。我们当然还不能据此就说当时已经有个独立的知识阶层了，真正独立的知识阶层是需要“市场”的，这市场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自由选择空间和必要的生存空间，具体地说，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获得生存所需。这种市场，要到春秋时代才真正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具有特权的群体——原始神职以及祭祀的专业人员。春秋时期楚昭王与其大臣观射父之间有一番关于天地能否相通问题的对话，观射父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



红山文化 青玉兽形饰

坛场之所、上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提到的觋、巫、祝、宗，其实就是王权和神权的中间人物，他们的地位比较特别，有点像半独立性质的阶层，既是政治群体，又是职业群体。不论是哪一种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类似后代的知识群体。

上古时期，许多方面无疑是粗疏浅陋的，但是，厚古薄今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偏颇，古代文献往往过分渲染那个时期的朴素美。比如《礼记·礼运》这样描述上古社会的制度：“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似乎是一个具有完善的选举制度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淮南子·齐俗训》这样描述上古的民风民俗：“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铍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真是一群气度娴雅、至淳至朴的好公民。从这些文献记载出发，我们自然很容易推断那个时代稍有知识的人都过着远比后代知识分子幸福得多的生活。

其实只要一对比考古发掘的情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献中对于那个时期的描述，在美化社会制度、人们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也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程度，忽略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苦闷。

二 制度的出现与演进

原始社会曾经经历母系氏族阶段和各部落间不相往来